

蒙在鼓里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Lily Poberezhska，一位年轻的乌克兰母亲和教师，回忆核事故后的那些时刻、日子和岁月。

4月26日星期六爆炸发生后那一天，大多数基辅人毫无觉察、像往常一样愉快地生活着。那天，我所任教的那个外语学院举办了一场师生组织的业余爱好者音乐会。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愉快，直到一位同事说，“噢，你们还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吧——切尔诺贝利电站爆炸了”。她恰巧是乌克兰内务部的女儿。

那天，第二天和星期一一整天，都没有来自任何苏联官方人士的消息。事故后的3天里，人们一直都被蒙在鼓里。但是这种消息掩饰恰恰和我们所看到的情形相反，在当局决定疏散该电站10公里内的居民时，救护车和空公交车拉长队向北行进，军队也被调遣。

难怪谣言开始四起，我们感到越来越恐慌。没人知道反应堆被毁坏得有多严重，我们应当等着全部的核爆炸还是疏散命令。没人告诉我们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为了打听消息，人们求助于他们知道的核科学家和医生——这些人突然

变得极受欢迎。但是没有可核实的数据，他们也帮不了多大忙。

勉强承认

终于，4月28日星期一晚上9点，莫斯科电视台的一位面无表情的新闻播音员播报了来自部长会议的一份简短的四句话声明，它引起至少和它所回答的一样多的问题。声明说：“切尔诺贝利电站发生了一起事故，其中一座反应堆被毁坏。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后果。受事故影响的人正在得到帮助。一个政府委员会已经成立。”

后来，这个官方宣传机器还试图传播表明状态正常的消息。甚至在4月30日基辅辐射水平急剧上升时，当局仍决定继续在基辅举行传统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成千上万的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沿那条大街行走。此外，为表明一切正常，向群众致意的乌克兰党领袖还带上了他们的小孙子孙女。但基辅人不久就通过小道消息听说，大游行一结束，这些首脑人物的孩子孙

子女就被迅速送往机场和疏散了。这使我们感觉被出卖了，感到极端愤怒。

5月初，当局承认事故比起初所想的要严重，但是仍然“没什么可担心的。”地方媒体播放和登出了一些建议，建议基辅人应当采取一些像关闭门窗和冲洗地面这样的“预防”措施。但那时，对官方消息的信任已被完全破坏，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基辅人都认为，基辅对于我们的孩子已不再安全。

没有孩子的城市

到5月的第一周，大批的母亲和孩子开始离开基辅。我把3岁的女儿送到莫斯科，留在亲戚家。在基辅火车站，狂乱的父母从车窗把孩子塞进火车，请求更幸运的乘客把他们送到另一端的亲戚家。留下的人开始荒唐地狂饮红葡萄酒（认为能帮助体内辐射排出）。没有孩子的基辅看起来可怕得像童话《花衣魔笛手》中的哈默尔恩镇。

至少在灾难后的一年里，基辅人都生活在一种核妄想状态。有高度核爆炸危险，第聂伯河被严重污染，等等，这类谣言大约每月涌现一次。我们曾痛苦地开玩笑说，我们“会死于消息，而不是辐射”，也就是说到处是相互矛盾的传闻和对任何官方消息的彻底不信任。

飞去来器的策略

一开始，苏联政府的“传播策略”是完全封锁或掩饰消息。当这种策略失败后，他们试图降低灾难等级，粉饰政府和它引以为豪的事业——苏联核工业。在老百姓看来，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大和对人民生命的公然漠视。

它是一个关于在危机中如何不传播的教程案例，因为人们认为这个“团体”（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把自己“团体的”利益置于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环境之上。另外，它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它不仅给世界范围内核工业的声誉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使公众更加意识到与核工业有关的危险，它还带来公开化的政策，这种政策又加速了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你可以说核乌云还有光明的一面。

Lily Poberezhska 是设在伦敦的咨询机构“国际媒体活动者”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她曾为世界银行、欧盟、国际开发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多个组织工作。1992年她同丈夫和女儿从基辅搬到伦敦，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频道工作了10年，报道前苏联国家的项目。电子信箱：mpinternational@lycos.co.uk。

“对官方消息的信任已被完全破坏，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基辅人都认为，基辅对于我们的孩子已不再安全。”

照片：Lily Poberezhska 和她的女儿在乌克兰

